

谣言政治与文化运作

——以上海光复前后的《时事新报》和商务印书馆为例

陈捷

摘要 作为清末立宪政治团体预备立宪公会机关报的《时事新报》，在张元济、汪诒年的带领下，原本是为了灌输国民政法知识、预备立宪而创设的。但是在武昌首义的革命风潮影响下，随着张謇、张元济等人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立宪党人内部的分裂，它与沪上其他报纸一道积极投身革命宣传以激荡风潮，尤其是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编辑出版了《革命文牍类编》《中国革命记》《革命党小传》等大量的书籍、期刊，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而考察这些文化生产背后的种种因素，除了与立宪党人思想倾向革命、沪上政治氛围浓厚有关之外，时事新报馆和商务印书馆当时面临革命党人的谣言政治的压力，是必须要予以充分考量的。在谣言充斥的革命压力铸就的舆论生态中，时事新报馆和商务印书馆通过自身的文化生产不但证明了自身的政治立场和革命倾向，而且化解了革命党人的谣言政治带来的巨大压力。

关键词 谣言政治 文化运作 《时事新报》 张元济 商务印书馆

作者陈捷，南京理工大学艺文部副研究员（江苏南京 210094）。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0)04-0169-16

如果我们拨开尘封已久的历史烟云，回首一百多年前辛亥革命前后沪上历史场景，我们就会发现当时上海的新闻出版业在革命的浪潮中几乎都表现得异常进步，除了革命派的《民立报》《民主报》《神州日报》不余其力地鼓吹外，就连立宪派背景的《时事新报》，在主编汪诒年的带领下，不仅从正面广泛、深入地报道武昌起义的相关消息，而且以时事新报馆的名义与上海“自由社”合作编辑、出版了大量的革命文献资料，比如《革命文牍类编》《革命党小传》《中国革命记》等，就连一向以平和持重为特点的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了《中国革命纪事本末》《大革命写真》等书籍画册，以为革命之宣传。这些书或期刊一版再版，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直到今天，也是我们研究辛亥革命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毫无疑问，立宪派的《时事新报》和商务印书馆最先出版有关武昌首义的革命史料构成了辛亥革命前后沪上新闻出版业一道奇特的风景，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书籍都是在怎样的一种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之下得以问世的呢？

—

《时事新报》的前身《时事报》是由邵松权等人于1907年12月5日集资创刊，延请汪剑秋主编。1909年因经营不善被上海道台蔡乃煌收购并入了由狄葆丰创办的《舆论日报》，后更名为《舆论时事报》。1910年9月23日出版至第999号再次进行改版，第1000号则又改回原名《时事报》，报务由孙家振、雷绍主持。1911年5月18日《时事新报》正式面世，如果深究《时事新报》的诞生，则与张謇、张元济、郑孝胥、孟昭常等人主持的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有关。预备立宪公会，是清末著名的立宪政

团，成立于 1906 年 12 月 16 日，是响应当年九月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的旨意而成立的，它的目的就是“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为基础。1911 年 2 月 6 日，预备立宪公会召开新年大会，并补行上年年会，由于会员分处各地，因此采用通信投票的办法，张謇当选为正会长，郑孝胥和张元济当选为副会长。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作为沪上工商界翘楚自然成为了立宪运动的重要阵地，除了张元济之外，夏瑞芳、高梦旦、李拔可、孟森、印有模、陆尔奎等商务印书馆成员都是预备立宪公会成员。

既然要让国民明悉国政，宣传教育民众的工作就极为重要，但是在张元济的眼中“中国报界堕落极矣”^①，因此，在 1911 年初，张元济一方面准备创设杂志，来宣传立宪，在他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谈到，“再敝馆明正拟发行《政法杂志》，月出一册，冀以普通政法知识灌输国民，拟乞大文一二首，冠之简端，以增光彩。”^②另一方面，张元济就是要创设报纸，与《政法杂志》一道形成组合拳，来更广泛的宣传立宪。该报的经费主要来自张謇，曾经担任过《时事新报》经理的张云雷就直接说，“《时事新报》最初是由南通张謇办博览会赚来的钱办起来的。”^③无论从经费来源或是办报主旨来说，《时事新报》都是与预备立宪公会有极大关系的。

1911 年 4 月 5 日，张元济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说：“日报为今日一大要事，京中要人无不各挟一报以自护，从此国中恐只有个人之私言，而无国民之公论，非有贤者出为拯救，世道人心真不可问矣。友人去岁购入《时事报》，弟归自海外，来相商榷，宗旨相同，约集得三万金，尚不能动手。饷械未足，不敢轻易出战。然已踵决肘见，窘态毕露，亦可见近日经济之困难矣。但祝天佑中国，早赐刀环，旌旆归来，定当虚左以待。但不知何日方偿此愿？”^④在 1911 年 5 月 12 日，也就是《时事新报》面世前一个星期，张元济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又说：“日报近稍稍布置，拟即日更换面目。惟人才太缺乏，即云改革，恐亦不过如近日之新内阁。前书谓日报为不可缓之事，将至台湾有所谋划，不知果有端绪否？”^⑤此时，张元济已经透露了想要革新《时事报》的想法，即“拟即日更换面目”。在 1911 年 5 月 31 日，此时《时事新报》已经面世，张元济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说：“《时事新报》为弟与梦旦数人所组织，仍延伸谷综理社事，已属发报处按期邮呈，敬祈教正。”^⑥又说：“《时事新报》已属按日邮呈，其中舛谬之处务祈勿吝教诲。今日所谓舆论，无非一种偏激之谈，实不足以膺国民先导之任。敝报颇欲力矫其弊。而彼众我寡，不知何日方能唤醒群迷？想公闻之当亦为之扼腕也。”^⑦可见，从《时事新报》创立一开始，张元济就对该报寄予了极大的期望，之所以按日给梁启超邮寄该报也是希望作为立宪党人精神领袖的梁启超能多多支持它的发展。作为预备立宪公会的机关报，张元济对《时事新报》极为重视，据郑孝胥日记记载，创刊后张元济曾专门来访，“谈《时事报》推广情形。”^⑧张元济选派去主管《时事新报》的就是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职员、汪康年胞弟汪诒年。^⑨

当时，晚清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革命的形势可谓是一日千里，而以各省咨议局为代表的“民气”日益伸张^⑩，立宪派知识分子逐步站在了清廷的对立面。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预备立宪公会

① 张元济：《致汪康年书》，参见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312 页。

② 张元济：《致梁启超书》，参见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第 313 页。

③ 张云雷：《〈时事新报〉忆旧》，《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文化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年，第 117 页。

④ 张元济：《张元济全集》（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年，第 217—218 页。

⑤ 张元济：《张元济全集》（三），第 218 页。

⑥ 张元济：《张元济全集》（三），第 220 页。

⑦ 张元济：《张元济全集》（三），第 220 页。

⑧ 参见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第 321 页。

⑨ 据郑贞文在《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一文，汪诒年在 1908 年时即与蒋维乔、庄伯俞等同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职员。

⑩ 徐佛苏曾说“各省风潮集中之地，即为咨议局。盖因该议局之权力，可以代表民意，收受省民请愿，以监督本省之行政长官故耳。当日四川咨议局长蒲殿俊氏，湖北咨议局长汤化龙氏因彼此久有国会请愿团及宪友会之关系，又因请愿代表被清廷驱逐，吾辈同志有密谋地方革命一段事实，故汤、蒲两氏乘此机会力谋川、鄂合作，借铁路风潮以推翻清室，蒲氏因得有鄂咨议局之后援，乃胆魄愈壮，决欲借保路权以张民权，故誓死代表民意，痛诋清室昏暴，激昂悲壮之电文不下数十通，随时登载报纸，激励国人。”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605 页。同时徐佛苏还指出咨议局和梁启超之间的关系，“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咨议局，界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并可知先生四十年间以著作报国历史，实以此次运动者为第二期之事业。”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608 页。

的张元济、高梦旦、郑孝胥等人才购入《时事报》并更名为《时事新报》的。《时事新报》就是诞生于这样一个政治大转换、文化大激荡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环境中。

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吹响了共和的号角。此时作为预备立宪公会机关报的《时事新报》，面对风起云涌、一日千里的革命形势，展示出了怎样一种政治姿态呢？在革命的洪流中，以立宪起家的《时事新报》又是如何应对这个时代的呢？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乱象，在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中、在血雨腥风的暴力革命中，《时事新报》在面对谣言四起的舆论乱象带来的政治压力时又是如何危机公关的呢？

一方面，立宪党人此时在革命大潮冲刷下早已分崩离析，已经主张民主共和的《时事新报》极力撇清、切割与仍然顽固坚持君主立宪的原立宪党人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在更廓大的历史背景上来认识这个问题。

立宪党人内部原本就派系林立、矛盾众多，只是由于有清政府的严厉压制，才勉强地团结起来、共度时艰。1912年在孙洪伊写给梁启超的信中就谈到了立宪派内部的矛盾，“中坚人物，本多旧识，非请愿国会时曾共一团者，即前宪友会之会员，当时于精神上隐分两派（一近朴拙诚实，一近灵华巧黠，非敢谓其有所轩轻，而精神上之不同则由不可为讳者），事实上亦时有竞争（例如中美银行之争，张君季直及孟君森主之，而同人反对铁路借款之争，孟君昭常、黄君为基主之，而同人反对之。）”^①孙洪伊这里所说的“灵华巧黠”派是指以张謇为首的预备立宪公会的温和分子，“朴拙诚实”派指孙洪伊、汤化龙、蒲殿俊等立宪派内激进分子。从历史上看，长期流亡海外的康梁一派与以张謇为首的江浙派关系原本比较冷淡，在因缘结托、政策路径、人际交往等方面，梁启超与预备立宪公会的张謇、郑孝胥等人的主张与行动也大相径庭。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梁启超在写给同党徐君勉的信中表示：“两年以来，朝贵中与吾党共事者，惟淘、洵两人而已，而淘实无用，可用者惟有一涛，而涛与泽地位相逼，暗争日甚，去年解禁之议，涛、洵争之不下十次，而梗之者则泽也……泽遍布私人，如张謇、郑孝胥之流，皆为之鹰犬，而外之复与袁结，务欲威涛于绝地。”^②可见，正是由于与张謇等人结好的载涛等人的阻挠，让梁启超利用载涛达成宪政的计划归于失败。皇室内部的矛盾与立宪党人内部的分歧交织在一起，可谓错综复杂。^③

除了历史上的旧矛盾之外，新的矛盾仍然在延续着。首先，在对待武昌革命的态度上，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对于革命党发动的武昌起义本身，梁启超并不认为其会成功，因为在他看来革命党高层内部相仇，破裂之势已成，且革命军只有割据之心，外国瓜分中国也只是时间问题，“此吾党所当认之甚真，万不可缘彼辈一时之声势，而遽为所炫者也……故革命军杀尽满人之时，即中国瓜分之时也。”对革命并不看好，但梁启超等人认为这是实现宪政一个极好的机会，虽然它打乱了梁启超谋划已久的拱卫中枢、宫廷兵变的筹划^④，梁启超向党人坦承，自己的政策就是“和袁慰革，逼满服汉”。宏图落空之后，梁启超仍然坚持要实行君主立宪，他坦承，“夫痛恨满人之心，吾辈又岂让革党，而无如此附骨之疽，骤去之而身且不保，故不能不暂为过渡，但使立宪实行，政权全归国会，则皇帝不过坐支乾修之废物耳。国势既定，存之废之，无关大计，岂虑其长能为虐哉。吾党所坚持立宪主义者，凡以此也。”^⑤可以说，直到1911年底，梁启超所怀抱的思想仍是老套的“虚君共和”。就在梁启超坚持主张虚君共和的同时，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让张謇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武昌起义之初，张謇立即向铁良、张人骏、程德全等晚清地方实力派建议，要求合力援鄂、速定宪法、立开国会，对形势的忧虑以至于让他夜不能寐，但是革命形势的迅

① 丁文江、赵丰田主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5页。

② 吴天任：《梁启超年谱》（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86页。

③ 而梁启超与张元济于个人私谊、文化倾向和出版事业上交集较多，关系因此较好。

④ 梁启超所运动的武力主要是清军吴禄贞统制的第六镇和张绍曾统制的第二十镇。但是，就在梁启超回国后希图大展宏图之时，吴禄贞遇刺身亡，张绍曾和蓝天蔚已入京，因此未曾得见，且传出蓝天蔚有不利于己之意，因此无功而返，前功尽弃。

⑤ 吴天任：《梁启超年谱》（二），第885页。

疾发展以及人心向背的大势所趋让他很快放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 1911年12月顺直咨议局曾致电张謇劝其共襄和平以全大局, 张謇在回电中拒绝了该咨议局君主立宪的提议, “惟敝省人民鉴于汉口江宁官兵淫杀焚掠之惨, 决欲组成世界最良之政体为民请命, 俾不至留第二次革命之种子, 是对于君主民主问题已无待商之地, 倘荷赞成此旨, 共同提倡, 全国一致则战祸永息, 岂徒一时大局幸甚。”他甚至在组织上直接切断了和前清咨议局的历史渊源, 宣布江苏临时省议会的成立, “敝会十月初一日成立, 旧咨议局即日消灭合并。”^① 不仅如此, 张謇还积极与赵凤昌、汤寿潜、程德全、陈其美等人合作, 调和诸军以组建革命临时政府, 他先是受命担任两淮盐政为革命军筹款, 后来又与程德全、章炳麟等人议创统一党。而在张元济一面, 1911年12月21日, 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在袁世凯授意下为张元济补授学部副大臣, 在回复袁世凯坚拒该职务的电文中, 张元济表示: “宗旨不合, 不敢承受。既承雅意, 愿进一言: 人心如此, 大势已去, 全局安危, 系公一人, 若必强行遏抑, 不特祸国殃民, 即为皇室计, 亦何必争此虚位, 以贻无穷之奇祸。事机危迫, 望速断行。”^② 可见, 张元济对君主立宪早已弃若敝屣, 在倾向于共和的同时, 作为以文化教育矢志终身之人, 他也并没有直接投身革命斗争的洪流之中, 而是用文化出版的方式间接推波助澜。

甚至立宪党同一派别内部也呈分裂迹象, 预备立宪公会副会长郑孝胥在武昌革命爆发之后一方面认为这是清政府暴虐苛政、苟活偷安的必然结果, 但是另一方面却也从保皇立宪的立场上坚决反对革命, “彼倡乱者, 反流毒全国以利他族, 非仁义之事也……使革党得志, 推倒满洲, 亦未必能强中国, 何则? 扰乱易而整理难, 且政党未成, 民心无主故也。”他认为革命党的行动只能导致手足相残、举国糜烂, 反而是让日本人从中渔利, 瓜分亡国之祸势不能免。他希望袁世凯可以借革命逼迫清政府开国会、定皇室、行立宪。确实有一些立宪派对此抱有幻想, 1911年九月九日(10月30日), 清廷下罪己诏, 表示开放党禁, 革去皇族内阁制度, 制定宪法并组织完全内阁, 11月1日清廷命袁世凯代替庆亲王奕劻担任内阁总理大臣一职, 在这样的权力转换时期, 有消息称: “京师各政党讨论今日挽回大局政策, 约期与阁臣谈判以冀早日进行。”^③ 10月31日又有消息称, “各政党代表赴庆邸与总协理筹议挽救大局之策, 闻已决定数款。”^④ 为此事, 预备立宪公会驻京办事处给上海董事发电, “今日各政团派员诣庆邸协商改革事宜。本会以孟昭常往, 乞告会员。”^⑤ 上海预备立宪公会立刻回电: “北京宪报馆: 孟政团派员诣邸协商改革, 此事大反国民心理, 北军恣意焚杀汉镇如洗, 东南人心愈激, 罪己诏且不足以动之, 遑论其他大势, 如此本会已无活动之余地, 公无论如何主张勿用全体名义。上海预备立宪公会。”^⑥ 宪友会江苏支部也给宪友会总部发电, “闻在京各政团派员诣庆邸协商改革事, 政府一面下罪己诏, 一面大杀汉口人民, 而各政团犹欲与虎谋皮, 可哀可耻, 总部如亦与闻, 本支部绝不承认。”^⑦ 可见, 立宪党团无论是派别之间抑或是同一派别内部在如何看待武昌起义、是不是要坚持君主立宪这个问题上, 已经彻底地分崩离析了, 沪上的立宪团体已经纷纷转换了立场, 站到了共和一面要求与清政府决裂。

第二个方面, 面对风起云涌的武昌革命及其引发的全国革命热潮, 《时事新报》在舆论方面毫无疑问是热烈地支持革命者的, 这与上海报界整个大环境息息相关。

武昌首义爆发之后, 上海报界即立刻予以关注报道, 《申报》《民主报》《民铎报》《神州日报》等积极地报道了武昌首义的消息, 对革命者表示同情, 对清政府昏庸无道、失尽人心表示谴责。《申报》在1911年10月17日发表了评论《革命军与政府》一文, 其中对革命军在军事、外交、民生上的种种举措表

①《张謇知和平不易》,《盛京时报》1911年12月7日,第7版。另,据《盛京时报》12月8日《江苏咨议局消灭之电告》记载:“敝会奉程都督召集本月期成会,苏咨议局即灭,江苏临时省议会长张謇麻。”武昌起义刚爆发时,张謇就以咨议局名义致电内阁,主张立刻宣布立宪、开国会。由此可见其数月之内转变之速。

②参见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第348页。

③“专电”,《申报》1911年11月1日,第1张第3版。

④“专电”,《申报》1911年11月3日,第1张第3版。

⑤参见《革命文牍类编》(二),《辛亥革命文献丛刊》(13),扬州:广陵书社,2011年,第6468页。

⑥《各团体皆敢言矣》,《申报》1911年11月3日,第1张第6版。

⑦《各团体皆敢言矣》,《申报》1911年11月3日,第1张第6版。“庆”指庆亲王奕劻,时任内阁总理大臣。

示赞扬：“凡此种种革命军之布置，可谓周密而有见信天下之能力，天下之人无一非议之者。”并对北京政府急于镇压革命、压制报界、失去人心的做法表示批评：“然则胜负之数，以彼较此，盖有不待龟筮而可知矣。奈何尚欲以强力压抑北京报界使不谈鄂事耶。”^①平和持重的《申报》尚且如此，其他倾向于革命的报刊则更是对武昌首义不吝溢美之词，热烈欢呼革命成功的到来。各家报纸虽然不见得个个都赞成革命军，但毫无疑问，没有报馆公开反对革命军，可以说这是当时普遍民气和社会公论的反映。为了在新闻报道上抢占制高点，各报馆纷纷革新报道方式，有的报纸增加版面或是创设专版，有的则在新闻上配发有关照片，广为招徕读者。1911年11月3日，革军占领沪上军营并攻打制造局，后占领上海城，“人民击掌欢呼之声如雷，此亦可见人心之一斑矣。”^②

上海光复意义重大，原本湖北革命军和清军呈相持之势、互有胜负，除了湖南相约而起之外，各地大多抱观望态度，革命形势之所以柳暗花明，最重要的推手就是上海光复。此后，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省份亦积极运动独立，11月上旬南京、苏州、镇江、无锡、宁波、嘉兴等地光复，等到11月底广西、云南、湖南、江西、福建均已光复，“长江以南实无半片属清之土，甚可为民军前途欣贺。”^③可以说全国各地革命形势一日千里、澎湃汹涌。

在这样的“革命”热潮中，立宪派的《时事新报》表现得尤为突出。可能正是由于有立宪派的历史“包袱”，身份暧昧的它在报道武昌首义的时候表现得尤为“革命”，无疑，这是一个让它展示自己在革命时代“脱胎换骨”、表明自身进步立场的极好机会。1911年10月17日《时事新报》增设了午报来进一步深入地报道武昌起义的消息，除此之外，时事新报馆还曾增加月刊和星期画刊对革命进行报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时事新报馆顺应时势、体贴民意，从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九月（阳历10月份）就及时地连续编辑发行了《中国革命记》（周刊）、《革命党小传》等出版物。

《中国革命记》（周刊）从辛亥九月（即1911年10月份）开始出版，该期刊最初由上海“自由社”、后由“时事新报馆”编辑，“上海望平街时事新报馆发行”，1911年共发行前4册，1912年发行第5至30册，每册一角五分。该刊物主要固定的栏目由图画、记事、言论一斑、传记、文牍、杂录、章程、文苑等组成，其中记事一栏又分为记事一（大事记）和记事二（交战记）两部分，除了第一期记事栏中大事记日期范围从八月初五日起至三十日止、交战记从八月二十六日起至三十日止、第二期记载的范围是从九月初一至九月初十日止之外，从第三期开始基本上每期都是一周的时间范围，因此《中国革命记》不但可以实时追踪时事，而且从“每周”这样一个较恰当的历史景深来观察辛亥革命态势的发展与演进。我们以辛亥九月出版的《中国革命记》第一期为例，在图画一栏中，不但有对战事、战地的影像介绍，而且还刊登了武昌首义的革命领袖黄兴、黎元洪、汤化龙等人肖像照片，而在传记一栏中，首先就介绍了革命先行者孙文，详细介绍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经历，对其革命先行者的功绩评价极高，“今日革命军突起，数旬之间，天下响应，共和政体不久将成立，则孙文之功固伟矣。”^④在“言论一斑”里，发表了《论中国革命之由来》，对清政府的倒行逆施极力抨击，认为官逼民反是辛亥革命的真正缘由；而在《外人之评论》中，《中国革命记》编辑借“巴黎某报”的名义表示，“武汉革命之文明，历史上所罕有，实可为世界之模范”；又借“汉口外交团”的名义表示：“革命地方，其秩序倍胜于未革命之前。”又借“日本时事新报”的名义表示：“中国政府腐败情形，非革命不足挽回之，但此次革命若再失败，将不免各国瓜分之事。”^⑤诸如此类借外人之口赞美武昌首义的言辞，所在皆是。在“文牍”栏中则登载了“中华革命军总统檄告天下文”和“中华民国鄂军都督黎檄告天下文”，两则檄文都论列满洲异族统治对

① 无名：《革命军与政府》，《申报》1911年10月17日。

② 《本埠特别纪事》，《申报》1911年11月4日。《申报》在5日即删去了报头上“大清宣统三年”的字样，11月8日，民政总长发出布告，表示即日起恢复黄帝纪元，不许再用“宣统”等字样。

③ 无名：《胜败之数》，《申报》第1张第1版，1911年11月29日。

④ 《孙文》，《中国革命记》（第1册），《辛亥革命文献丛刊》（9），第4028页。

⑤ 《外人之评论》，参见《中国革命记》第1册，《辛亥革命文献丛刊》（9），第4021、4022页。

华夏儿女的摧残凌辱，并以黄帝纪年的方式宣告种族革命复兴汉种的荣光。而到了第二期《中国革命记》，就因时势的发展，不但在“图画”栏里介绍革命者，而且在“大事记”和“交战记”里介绍了九月初一日至九月初十日（即10月22日至10月31日）的革命进展，尤其是在“文牍”栏内刊登了“中华民国南军都督檄告汉人之为满清将士文”和“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讨满清檄文”，在“章程”里则刊登了“湖北军政府内部组织之条例”。可以说，这些文告都是在辛亥革命期间沪上第一时间有组织、有系统地发布的两湖地区革命者的声音，1911年10月22日，新军四十九标在长沙举义，当日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宣告成立，随即发布讨满清檄文。这则檄文在辛亥九月即出现在了《中国革命记》第二册中，可见其对革命宣传之及时迅速。

而出版于1912年的《革命党小传》主要介绍了革命党人1911年以前事迹，该书第一、四、五、六册为上海“自由社”编辑，第二、三册为“时事新报馆”编辑。其中介绍了孙中山、黄兴、秋瑾、林觉民、陶成章、彭家珍、陆皓东、史坚如、徐锡麟、熊成基等革命志士达一百六十九人之多，重要人物大多附有照片，对他们的革命历史和事迹大加宣传和褒扬，尤其是对他们的交往和人物关系多有介绍，可以说这样编辑方法为普通民众了解革命的由来、增进对革命者的了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对孙中山的介绍中，就提到：“惠州次第失败，志未遂，乃更于长江沿岸大植革党实力，已而孙来日本结纳留学生，冀成中国革命大团体，于是时始识黄兴，更与胡衍鸾、汪兆铭、陈天华、宋教仁等共谋推倒满清政府，今日革命军突起，旬日之间，各省响应，必以孙文为后应。”^①可以说，这样的宣传为广大群众认识、了解革命者交往脉络，了解革命的历史渊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除了《中国革命记》和《革命党小传》之外，时事新报馆从1912年1月开始，连续编印出版了十册《革命文牍类编》，该书各册均一版再版，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宣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和革命者的方针政策、鼓动革命情绪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该书第一册“例言”中提到了编辑方针：

一本编所撰以革命军政府业经发表之文牍为主，故名革命文牍类编

一本编分为檄告、布告、照会、示谕、函牍、祭告、章程及规则、电报，凡八类各文依类编列，不稍紊杂

一广东革命在辛亥三月虽未及设立军政府，其文牍已发表者皆列于每类之前

一湖北军政府首先成立，故各文选录较多

一湖南军政府相继成立及已发表之文牍亦一律选录，列于湖北军政府文牍之次

一各省革命军纷纷响应以后各处文牍尚当详为搜辑，陆续编订印行

一文牍之无关重要者酌量删弃，阅者谅之

从“例言”以及发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时事新报馆利用报馆职业的便利，颇为用心地搜罗了从武昌起义爆发前后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期间革命军政府发出了各项文件以及北洋实力派与革命者通信来往、公告照会的各类函电，构建了丰富、立体、生动的时事态势、人物动向、舆论生态的历史场景并保留了第一手原始资料。

《革命文牍类编》《革命党小传》和《中国革命记》作为时事新报馆的一套组合拳，不但增加了读者、拓展了营业收入，而且在深入宣传革命之外，树立了时事新报馆与时俱进、拥护革命的进步形象，由立宪党背景的报纸来宣传革命，无疑构成了辛亥革命时期沪上独特的一道风景线。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些书籍、杂志的编辑和发行，我们就会发现它们都与“上海自由社”和“时事新报馆”有关，而且两者的标注在书籍刊物封面和封底上颇显混乱，我们以《革命文牍类编》为例，它的第一册至第六册为中华民国元年正月出版，第七册至第十册为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出版，一至八册封面均显示“时事新报馆发行”，但是从第五册开始（除第七册外），封底显示该书由“上海自由社”编辑发行，第九、十两册封面封底均显示为“上海自由社出版”。而在周光培主编的《辛亥革命文献丛刊》第十三卷

^①《革命党小传》，上海：上海自由社编辑，1912年，第4页。

收录的《革命文牍类编》版本则第一至第十册封面上全标注的是“时事新报馆发行”字样，可见该书在1912年初多次重版的过程中，版本的标注是不同的，但是如果我们结合编辑手法、体例安排两者的统一性、一致性不难看出，所谓“上海自由社”应该就是张元济麾下的商务印书馆和时事新报馆为了发行便利而成立的小团体。

那么，打着“上海自由社”和“时事新报馆”的旗号进行革命宣传的具体人物是谁呢？我们必须指出，既拥有时事新报馆、又拥有商务印书馆的立宪派沪上首领张元济是这些革命宣传的幕后推手，而商务印书馆蒋维乔、庄伯俞、王云五等人则是最初的编纂者，蒋维乔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商务印书馆在巨变时期所承受的经济压力以及自己受张元济、高梦旦等人指派编纂《中国革命记》《革命党小传》的来龙去脉。

1911年八月二十三日，蒋维乔在日记中记载：“晨八时半到所，是日上午编译所会议，因武昌革命军起，商业大有影响，如部稿件有可缓排缓印者，均提议从缓，惟英文国文二部照旧从事。”^①八月二十七日（阳历10月18日）记载，“是日编译所高、张二公拟将今年革命事实作革命记发售，午后即着手搜集材料。”^②二十八日记载，“八时半到所中花园，九时办事，是日搜罗革命记材料……昨日七点起革军与官军在汉口附近大战，胜负未分，九江已失守。”^③二十九日记载，“是日编广州革命纪事，此书初名辛亥革命记，今日议定将粤鄂川各省事件分作三册，余专任广州事件，故改今名……革命军于廿七日后连日与官军剧战，或言革军胜或言官军胜，谣传不一，因汉沪电报已不通，故无确信，今日闻长沙已失守。”^④八月三十日记载，“是日编译所王君云五有暇，革命纪事已交渠编辑矣……今日得消息知革军大胜，官兵已退至信阳，武胜关为革军所得……宜昌荆州已失守。”^⑤九月初一日记载，“晚至望平街报馆处听消息，官军败后北京政府甚惊惶，已派禁卫军逐段驻守郑州以北。”^⑥九月初三日记载，“晚至望平街探听战事消息，河南郑州亦有失守之说。”^⑦九月初四日记载，“助伯俞编武汉革命记事……今日革党将与北军大战。”^⑧九月初五日记载，“是日助编中国革命记。”^⑨九月初六日记载，“是日编革党小传。”^⑩九月初七日记载，“是日编革党小传。”^⑪九月初八日记载，“今日午刻时事报馆得专电，安庆已失守。”^⑫九月初九日记载，“是日编革命党小传毕。”^⑬九月十一日记载，“商务因官军革军交战，生意寥落，开销太大，拟下月起薪水一律减折，六十元以上者六折，六十元以下者七折。”^⑭1911年11月3日（九月十三日）上海光复，蒋维乔在日记中记载，上海市面丝毫不惊，“诚易如反掌也。”^⑮九月十五日记载，“三时后往望平街探听消息，知苏州杭州均已克复。”^⑯九月十六日记载，“是日校革命党小传。午后回家休息，闻北京已破，摄政王及宣统帝遁入某使馆，庆王被拘。”^⑰十七日，蒋维乔在日记中表示北京光复的消息不确。九月十七日记载，“是日作革命党传记。”^⑱九月十九日记载，“是日编革命

①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46、247页。

②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250页。

③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251页。

④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252页。

⑤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253页。

⑥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254、255页。

⑦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256页。

⑧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257页。伯俞即商务元老庄伯俞，张元济入商务在长康里设编译所后不久即邀请他人馆。

⑨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257页。

⑩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258页。

⑪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259页。

⑫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260页。

⑬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260页。

⑭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262页。

⑮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264页。

⑯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265页。

⑰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265、266页。

⑱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266页。

党传记。”^①九月二十日记载，“是日杂编革记。”^②九月二十一日记载，“是日编革命记。”^③九月二十三日记载，“是日编革命人物传记……南京张勋之兵残杀无辜，残暴已极，苏浙宁皆会师伐之。”^④九月二十四日记载，“午后到所办事，编革命人物传记。”^⑤九月二十五日记载，“是日编革记。”^⑥九月二十六日记载，“是日编革记。”^⑦九月二十七日记载，“是日编革记。”^⑧九月三十日记载，“是日编革记、校杂件。”^⑨十月二日记载，“是日编革记，校详解。”^⑩十一月十八日记载，“是日改国文，撰传记。”^⑪

从蒋维乔的日记中可见，从 1911 年 10 月 18 日受命编辑革命记开始，一直到 1911 年 11 月底，他大量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中国革命记》《革命党小传》这两个刊物的编辑工作上，到了 11 月初，他的工作重心似乎有转移，日记中出现编辞典、修改教育史、与江亢虎发起中国社会党、赞助女子参政同盟会、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等事项，编辑工作重心也有新的侧重，比如 1912 年 1 月 1 日（1911 年十一月十三日）他日记中记载，“是日编词典又各种教科书须修改，故又停编词典从事修改教科书。”^⑫随即十一月二十日（1912 年 1 月 8 日），蒋维乔接受蔡元培邀请准备离开上海商务印书馆，“鹤卿先生任民国教育总长之职，今日遇访，邀予往任总务科事，余允之。遂即调查教育制度各书，以为预备。鹤公当须赴杭一行，三四日后来沪，然后同往南京。”^⑬1912 年 1 月 11 日，蒋维乔到商务印书馆交接，“晨九时到所，是日将经手事件交代清楚，午前即回。”^⑭12 日下午，蒋维乔即与蔡元培乘快车赴南京。至此，蒋维乔受命编纂革命记的工作因为工作岗位的改变彻底结束了。

有几点从蒋维乔日记中不难看出，第一，张元济等人最初决定编纂武昌革命记是有其商业上的考量的。正如当时有的书局认为的那样，“武汉倡义，各省光复，非特武功昭著，即文字亦多可传诵者，如各省军政府的宣言书、誓师文以及黎程伍张诸伟人之函电，靡不发扬蹈厉，壮及河山，江苏教育总会议列此种大文于学校国文科。惟尚无编辑成书者。”^⑮在武昌起义导致商务印书馆商业大受影响、人员薪金打折的不利形势下，张元济和高凤谦等人也想从这个出版角度来在营业上开辟新的空间。第二，蒋维乔等人最初编辑《中国革命记》时已经着眼于革命的历史发展的全景，在革命形势的急遽发展之下记载的范围则从原先拟定《辛亥革命记》的粤鄂川三省扩大到了后来的《中国革命记》。第三，蒋维乔等人在编纂这些文献时与望平街时事新报馆是有密切合作的，由于战事的影响沪汉电报不通，所以望平街时事新报馆是蒋维乔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第四，署名为“上海自由社”编辑出版的《中国革命记》《革命党小传》都是由商务印书馆编译部国文部的蒋维乔、庄伯俞、王云五等人编辑而成的，比如《中国革命记》的第一至第六册都是“上海自由社”署名编辑的，之所以采用上海“自由社”而不是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名义则显然与当时上海尚未光复、清廷政治高压统治的社会现实有关，但是从辛亥十月出版的第七册开始，其后的编辑者就变成了“时事新报馆”，而这个转换时期恰好也就在蒋维乔编辑重心转换之后。此时，上海革命大

①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 268 页。

②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 269 页。

③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 269 页。

④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 272 页。

⑤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 272 页。

⑥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 272 页。

⑦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 273 页。

⑧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 273 页。

⑨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 275 页。

⑩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 276 页。

⑪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 295 页。

⑫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 293 页。

⑬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 296 页。

⑭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四），第 298 页。

⑮ 著易堂书局广告：《革命时代大文章出版》，《申报》1912 年 2 月 4 日。

局已定，采用上海“自由社”的化名显然已经没有必要了，考虑到时事新报馆和商务印书馆在背景、人事上存在交叉，因此其后编辑这些书刊的“上海自由社”和“时事新报馆”很可能就是同一批人员，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革命文牍类编》前后版本编辑者署名混乱的问题。

最后，我们必须强调一下这批革命文献版本的重要。《中国革命记》作为上海光复前就开始编辑出版的周刊，它与当时急遽发展、泥沙俱下的革命现实密切相关，在当时信息沟通不畅的条件下，最初的版本中有关人物的介绍常有错误，因此各个版本之间差异性不少。比如辛亥九月出版的最初版本的《中国革命记》第二册目次中“图画”栏内有曾广大、李克果、何锡蕃三人肖像，其中曾广大的肖像下有“中华民国占领宜昌勇将”的介绍，之后的版本中却删除了“曾广大”，只剩下李克果和何锡蕃二人。我们知道，曾广大曾任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标统，辛亥革命爆发之前，端方率领该军队入川弹压保路运动，11月26日曾广大率领入川鄂军在资州宣布反正，起义士兵要杀端方时曾广大极力反对，无果后连夜离队出走，回到湖北后曾广大被黎元洪任命为湖北军政府军务长，遭反对未任职。宜昌光复是在10月18日，可以说与曾广大没有多少关系。曾广大作为有瑕疵的革命者，在《中国革命记》第二册后来的版本中被删除了，可见《中国革命记》各个版本之间的差异本身就是一个革命大浪淘沙、剔伪存真的甄别过程。可以说，各个版本也留下了历史层积发展的痕迹，这是我们回首历史进程、辨正历史文献必须要注意的。

三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除了经济上的考量之外，时事新报馆的进步表现还与它身处险恶的政治环境、舆论环境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君主立宪的渐进改革的要求和共和民主的急进革命的斗争在中华民国正式建立之前一直针锋相对地存在着。1906年清廷就打着“预备立宪”的幌子来加强皇族的统治，随着辛亥年保路运动、武昌起义的相继爆发，清廷慌忙应对，九月初九（10月30日）清政府以宣统帝名义下“罪己诏”，表示革去皇族内阁制度，开放党禁，赦免党人，命令溥伦纂定宪法交资政院审定。清军内部也出现了要求改制的呼声，驻守直隶滦州的士兵不允开往南方，要求立宪^①，甚至表示：“皇上若不俞允，则军士将拔队向北京进发。查此种要求极关重要，海陆两军现与资政院有势力之议员同谋要求改革政务，闻他处军界中人亦拟照此要求云。”^②在滦州军队代表张绍曾要求立宪的奏文中说道：“此次变乱起原，其肇因虽有万端，消纳言之，政治之无条理及立宪之假筹备所产出之结果已耳。”张绍曾提议改定宪法、改革政体，他表示这才是平定武昌之乱的根本方法，“迅颁谕旨明白宣示，尊军心于一致，坚亿众之信从，则革党无自而煽，大乱由此而息微，特武昌匪祸可以刻日就平。”^③可见，这个时候清廷“立宪”，首要的目的并不是立宪本身，而是为了应对武昌起义带来的巨大政治压力。

因此，在革命者看来，此时要求立宪的毫无疑问就是反革命，尤其是在上海这样一个民气高涨、革命态势汹涌的地方。上海报界对这一点其实极为明了，“无论新朝廷与旧朝廷，必将旧日秽败之政治尽行铲除，然后秩序始可着手整理，若仅仅加以涂附之改革，犹是今日立宪之面目也。”^④在1911年11月3日民军占领上海之前，虽然报纸、民间对革命军持同情态度，但是沪上清廷的统治者还在垂死挣扎，为了控制舆论，沪道刘观察以沪上各报刊登鄂省战事违背报律为由，通令严查，如有违反要求严惩^⑤，并派巡捕暗探在各报馆逡巡，如果人多哄扰随时弹压。但沪上报界同情革命、支持首义的倾向并未改变。1911年11月3日，民军占领上海之后，沪军都督陈英士面临的局面是复杂的。在外，北军虎视眈眈，君主立宪的舆论和呼声甚嚣尘上，对革命政府构成极大威胁；在内，一方面要除弊政、保秩序、稳民心；另一方面，

① “专电”，《申报》1911年10月30日，第1张第5版。

② “专电”，《申报》第1张第3版，1911年11月1日。

③ 《滦州军队代表张绍曾等要求实行立宪原奏》，《申报》1911年11月3日，第1张第2版。

④ 东吴：《清谈》，《申报》1911年10月30日，第1张第4版。

⑤ 《鄂乱影响》，《申报》1911年10月25日，第2张第2版。

社会不稳定因素太多,据传满清暗杀队在沪活动,爆炸时有发生,因此,严查并悬赏缉拿北军刺客奸细、惩办汉奸的工作始终进行^①,可以说,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和革命的红色恐怖相互激荡,共同构织了紧张、暴力的历史氛围和社会环境。立宪党人在上海无疑就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平日讲宪政著名之人,在南中行动不能自由,佛苏在沪,寸步有人监察。有自北来者,动疑为政府侦探,在沪中而不从革党者,地位极危险云。”^②

在这样的严峻的环境中,报纸在政治形态上的敏感性、倾向性必然受到了敌我双方的高度重视^③,革命党人无疑是极为重视宣传工作的,“今兹革军之奏奇功,得诸兵力者仅十之三,得之言论鼓吹者乃十之七。”^④因此在上海,报纸自觉地去迎合政治环境的要求和约束就成为了必然。立宪派背景的《时事新报》无疑是有些尴尬的,以前立宪派的友人们还在北方呼喊着君主立宪,而已经抛弃立宪梦想的自己却身处革命的上海。

黑历史还在纠缠着,谣言如期而至。武昌起义之后,清政府迅速派兵镇压,湖北军政府于1911年10月18日扫荡汉口敌军,前后战斗41天,最终汉阳在11月27日失陷,史称“阳夏战争”。遵循“有闻必录”的原则,《时事新报》《申报》等报纸均在登载了义军汉阳失利的消息。但是本属正常的新闻报道却引起了以革命党人为代表的广大群众的不满,时事新报馆招牌被捣毁,并收到了写有“倘若再登官军胜革军败之谣,则将以炸弹奉送”之语的匿名信多封;申报馆特意在11月29日评论栏中发表了《胜败之数》一文,表示不能以一时一地的成败来评判民军,希望革命者屡仆屡起,表示了得人心者革命必成的信心。即便如此,申报馆也收到了再登载革命军败消息就以炸弹奉送的匿名信,12月1日晚申报馆也有群众聚众闹事,不得已申报馆在12月3日报纸头条刊登了所受到汉阳失守电文的影制铜板照片,以证明自己只是遵循“有闻必录”的原则,并非捏造。

与此同时,又有人在上海各处散发传单,其中表示,“近日袁世凯特派员孟庸生攀巨金来申,联合雷继声、张菊生、夏粹芳等主张君主立宪派,运动《时事新报》《新闻报》《申报》《时报》四家捏报汉阳失守等情,淆乱人心,凡我同胞切勿为其所惑,仍乞坚守一定宗旨,以图进行,民国幸甚,国民公启。”^⑤12月7日,郑孝胥在日记中记载,“又有革命团来函,内缄《中外日报》《晚报》二纸,《晚报》中有一则云:‘此次袁世凯以武汉起义不过一小部分;所最可畏者,各省响应,先后宣告独立。而各省独立之所以能如是之速者,皆缘于报纸之鼓吹,沪上各报鼓吹为尤力。因特商之郑苏龛,郑立言能担任运动各报事,并举孟庸生为副;当由袁世凯指拨银三十万,由郑、孟二人挟之来沪。当到沪之次日,郑、孟即邀同某某数报主任饮宴。席间,孟贼即盛称袁世凯之奇才,并反对共和政策,其言语颇有不堪入耳者。郑贼反对尤甚,口口大骂‘小孩子们何能成大事’,言语之间若有不胜其愤怒者。某某报主任赧然无耻,又附和之,谈及报馆机关一事,某某报艳其多金,慨然允诺。当时即由孟贼拟成一辰字号英文密电,初二日发出第一次电,其文曰:‘北京沙米司客代呈内阁总理大臣袁鉴:承嘱报界,已如命宣布,款已给。从中幸苏戡力成,余面奏。昭常叩,辰。’此电稿纸,郑贼所用之海藏楼诗草笺,其电文中‘幸苏戡力成’五字系郑贼亲笔自添者。噫,郑、孟二贼甘为袁世凯作奴隶而破坏共和政局,其肉岂足食乎!”^⑥《中外日报》则随之刊登了特别广告,“国民一分子伟鉴:昨接大札并郑苏戡、孟昭常致袁世凯运动某某报电稿一纸,敬悉。揭发汉奸隐私,热血义愤,钦佩莫名。惟郑贼海藏楼诗草笺英文电报原稿一纸,务求赐下,以便照相铜版登诸报端,温犀禹鼎,俾同胞有所留意焉。不胜盼望之至!本馆编辑部谨启。”^⑦

① 《沪军都督通告二》,《申报》1911年11月8日,第2张第2版。

② 吴天任:《梁启超年谱》(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06页。

③ 在武昌首义斗争期间,北军最忌讳士兵看革命报纸,有士兵阅看报纸被缉拿,立刻斩首标罪示众。参见《武汉之闻闻见见》,《申报》1911年11月28日,第1张第5版。

④ 吴天任:《梁启超年谱》(二),第908页。

⑤ 参见“本馆第三次宣言”,《申报》第1张第2版,1911年12月4日。

⑥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三),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366、1367页。

⑦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三),第1367页。

孟昭常，字庸生，孟森之弟，在1906年12月16日成立的预备立宪公会担任会董、驻办员，是该立宪团体的骨干分子，后任《宪报》主笔兼法政学堂校长。1911年11月15日《申报》登载电文称“清廷密派江苏资政院议员孟昭常挟巨资来沪游说革命军解散借探秘密”^①；11月17日，《申报》又登载消息表示又传言说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资政院议员出力最多，袁世凯运动经费达到数百万之多，袁世凯与资政院议员共谋挽救危局之策以从速结束战事^②；11月26日，《申报》再次把矛头对准了孟昭常，“袁世凯命资政院孟议员赴沪运动报界赞成其所持君主立宪之说，以冀保存满洲政府。”^③

面对尘嚣日上的谣言和批判，面对自己君主立宪时的旧友郑孝胥和孟昭常，身处报界且历史暧昧的《时事新报》处境确实尴尬，而《申报》则多日多次在报纸上为自己剖白，辩称岂有自己报纸揭露自己黑幕的做法。张元济也在1911年12月8日刊登启事，为己洗刷污名，“昨见国民公启传单，谓鄙人受袁世凯嗾使，为之运动报馆，造汉阳失守之谣云云。揣言者之意，不过谓鄙人欲借此以博富贵耳，鄙人于丙午复职以后，始终未入宦途，何独于危亡颠覆之时转发做官思想，若欲得钱，则取不义之财孰有如做官之便者。终岁勤劳，仅博砚田之获亦十有余年矣，何一旦忽改其初志也，钟鸣漏尽及时报复，哀我同胞何必甘为阮圆海乎，此等无稽之言本不足辩，因名誉攸关，兼恐有损各报馆之名誉，故特声明。”^④面对报纸上的攻击，孟昭常也在《民立报》上刊登告白，“言郑于九月初旬出京，孟迟久之始行，袁世凯入京又在其后，无从有商买报馆及带款来沪之事。”^⑤随后孟昭常又在《时报》刊登二次告白，指明《中外日报》伪造电文。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时事新报报馆与中外日报报馆又发生纠纷。^⑥1911年12月2日，《申报》发表了“健生”投稿的《革命危言》一文，12月4日《时事新报》也发表了这篇文章。对革命者“此一都督，彼一都督”的争权夺利现象略有批评，希望革命者有逊让之风，以为人心革命之提倡。其中表示“上无统一之方，下有分峙之象，此大乱之道也。”文中建议临时政府应该从速建立，地方官制应该尽快实行，避免无政府主义的乱象。如果我们比较《申报》《时事新报》上发表的两篇同名文章，就会发现它们稍有不同，这一点也被中外日报报馆“敏锐”地抓住了，利用它来做文章，在呈送沪军都督的呈文中揭发道，“革命危言中破坏革命之最力者即内治纷纠人心摇摇及欢迎革命者一变而为怨望，生灵涂炭之机遍布隐伏，再逾旬月势将爆发而不可收拾等语，申报知此数语有关共和政局，特删除不登，而时事新报以投身报界十余年老于阅历之汪颂阁氏，岂不知此，竟敢率尔登载，其居心概可想见。”《时事新报》登载未删节的《革命危言》之后，1911年12月6日《中外日报》刊登了叶存善等人《泣告同胞》的告白声明，其中，其中揭发《时事新报》受孟昭常运动而反对革命，尤其抨击《时事新报》刊登的《革命危言》一文是在宣扬革命为大乱之道，是反革命的宣传文章。这样的批判也并非空穴来风，《时事新报》上未删节的这几句话完全就是梁启超等立宪党人的观点，1911年10月29日，在梁启超致同党徐君勉的信中对武昌首义表达了几乎完全一样的看法，此后立宪党人多次表达类似的观点。

《时事新报》对此极为窘愤，不但刊发特别广告回击中外日报馆的诬告，而且向沪军都督提起控告，表示中外日报馆毁谤时事新报馆声誉，声明《革命危言》一文毫无反对革命之实，真正的反革命则是《中外日报》，篡改辞句来构陷同业，它们才有毁谤军政府、丑诋革命的言论。“总之，该报有意诬谤显而易见，本可置之不辨，特恐阅者不察，市三成虎，实于本报名誉有碍，谨粘呈本月十四日时事新报十六日中

① “专电”，《申报》1911年11月15日，第1张第3版。

② “专电”，《申报》1911年11月17日，第1张第2版。

③ “专电”，《申报》1911年11月26日，第1张第3版。

④ 《张菊生启事》，《申报》第1张第1版，1911年12月8日。

⑤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三），第1368、1369页。

⑥ 《中外日报》的前身是创刊于1898年5月5日的《时务日报》，是由汪康年、曾广铨、汪大钧等人合资创办，日报的日常经营管理则是由其弟汪诒年主持，1901年后成为上海滩较有影响力的报纸，1904年夏商务印书馆入股《中外日报》后因纠纷退出，1908年夏上海道台蔡乃煌购并该报，自此以后该报成为上海道台的官产。可以说，这个报纸是汪诒年入主《时事新报》之前所经营的最重要的事业。

外报十二日申报各一纸，敢恳麾下俯赐察核，传集人证，审讯明确，如本报有受贿之据、危言有反对之实，诒年谨引颈待刑，如系中外报有意诬毁，亦请严行究办，以保神圣之言论自由，事关大局，不敢缄默，伏候裁夺施行，实为公便。”^①从汪诒年指天誓日的呈文中也可以看出其激愤之深广。

1911年12月8日，中外日报馆也向沪军都督呈文，重申《革命危言》的反革命实质，而且再次强调了《时事新报》受立宪党人孟昭常运动的传言之可靠，“总之，该报反对革命及受人运动之隐私既被叶君所揭发，乃恼羞成怒，不得已而以控告为恫吓。要之，保世提倡共和政策遑论上级官吏不能压制，即白刃加前亦不稍变宗旨焉。谨将该报反对革命之言论及叶程二君泣告同胞广告之原稿一则呈览外，一面由叶君将该报受人运动确据再行续呈，俾分泾渭而惩奸邪，事关民国大局，伏乞卓裁施行，实为公便，谨呈。”^②革命派机关报《民立报》在12月11日也在“专件”栏内刊登了中外日报报馆的呈文，以为声援。时事新报馆和汪诒年的压力可想而知。

在革命党人、沪军都督陈其美面前打官司的双方身份很有趣，一方是前立宪党人背景的《时事新报》，一方是清政府官产背景的《中外日报》，它们双方在革命党人面前都极力攻击对方才是反革命，通过这样的方式政治站队来展示自身的革命立场和形象，这一幕也真是颇为滑稽。1911年12月11日，沪军都督陈其美的一纸批文总算是结束了双方的论争，“危言一则非但无反对之意，且足为各处民军砭石。此后王（汪）当时时有此箴规，庶足以保言论自由，俾为政者得闻其失。中外报误会词旨，指为反对，虽由爱国热度之高，究属失于斟酌，当此民族竞存时代，报馆愈多愈好，诂庸自相倾轧，致失报界资格，希汪主笔为大局维持，勿与争较，中外报应自知误会，引为失言，以后其各交欢，毋负本都督之厚望焉。”^③毕竟，上海刚刚光复，对陈其美来说，大敌当前，依仗新闻界、团结新闻界来扩大宣传、达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陈其美对《革命危言》中抨击革命派内部争权夺利的“此一都督，彼一都督”的观点是极为赞同的，上海光复之后，革命者内部围绕着上海都督一职产生了极大矛盾和分裂，同盟会的陈其美利用帮会势力排挤掉上海光复中功劳最大的光复会李燮和，李燮和后来在吴淞创建吴淞军政分府，在普通民众看来，似乎上海光复后出现了两个军政府、两个都督一般，在江苏也存在类似的现象^④。此时，也正是南京光复，孙中山即将回国，国内正筹举临时大总统之时，因此，已经大权在握的陈其美，显然是想借助舆论清理政军管理系统，维护同盟会以及自身统治的权威性和唯一性^⑤，因此他对于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无疑是赞同的。

而在商务印书馆一面，1911年12月初所谓“国民公启”传单谣传张元济、夏瑞芳等受孟昭常运动在《时事新报》等报纸上造谣民军汉阳溃败之后，商务印书馆立刻发动危机公关，12月5日在商务印书馆第66次董事会上，鲍咸昌提议抽薪助饷^⑥，除了在经济上支持义军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宣传上、政治上支持革命，12月15日，商务印书馆刊登广告，征求革命史料，“革命军兴，山河光复。废君主之专制，进国民于共和，岂惟四千年未有之盛，抑亦五大洲创见之局。不有纪述，奚诏将来。鄙馆同人不揣固陋，拟于大局底定之后，编辑全国革命史稿，以彰吾中华民国之光，兼备诸著述大家之甄择。现先搜辑材料，

① “时事新报馆呈沪军都督文”，《时事新报》1911年12月7日。

② “中外报馆呈沪军都督文”，《申报》1911年12月8日，第1张第3版。

③ “陈都督对于报界之希望”，《申报》1911年12月11日，第2张第3版。

④ 1911年12月5日，《申报》登载镇军都督林述庆致沪军都督电文，其中呼吁早日成立临时政府，“惟此疆彼界权限未分，就江苏一省论有三都督焉，揆诸名实，无此办法，区区之见，拟即将述庆镇军都督名义取消，全省公举一都督主持，以专事权。”参见《申报》1911年12月5日，第1张第3版。所谓江苏一省三都督指的是上海、镇江、清江三处，此外还有一个都督是扬州都督徐宝山。

⑤ 1911年12月13日，几乎就在陈其美批复两家报馆呈文的同时，陈其美在沪军都督府枪杀光复会会员、镇军参谋长陶骏保，罪状是在革军攻克南京时扣留子弹贻误战机、捏冒攻宁之功劳、在沪上散播妖言惑众等，参见《陶骏保枪毙矣》，《申报》1911年12月15日，第2张第1版；1912年1月14日，由于举荐浙江都督一职产生矛盾，在陈其美的指使下，蒋介石雇佣王竹卿暗杀光复会会员陶成章。为了调和同盟会和光复会之间的矛盾，孙中山在1912年正月三十专门致电广州陈竞存都督和中国同盟会，表示要避免纠纷，戮力同心，参见《革命文牍类编》（八），《辛亥革命文献丛刊》（13），扬州：广陵书社，2011年，第6859页。

⑥ “议定售书三天，以所得书资悉数捐助。如为数无多，再展期三天，再函请财政部派员到馆，每日收款，以昭核实。又议定公司于减扣同人薪水本月提取二百元，用同人名捐助军饷。”参见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第346页。根据1911年12月15日《申报》第1张第1版广告，此次卖书捐款共得大洋五百七十一元、小洋一百零一元七角二分。

分类汇存。虽各省报纸差已全备，而见闻异辞，终有缺略。伏求各省军政府、军政分府暨从事革命之团体、个人俯赐赞助，代为搜罗……凡有稿件，请寄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革命史编辑部查收。”^① 1912年5月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校订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一书出版，在商务印书馆为该书拟就的序言中自夸道：“是书其为有功于群治进化者抑非寻常纪载所可同年语”^②。此外，商务印书馆在1911年底还出版了《大革命写真画》多集，用照片的形式宣传武昌首义和江浙光复的革命场景以及人物，“这种五彩月份牌是商务印书馆赶印出来，迎接革命胜利的。”^③

如果我们把时事新报馆、商务印书馆的上海“自由社”在1912年初出版《革命文牍类编》《革命党小传》《中国革命记》《大革命写真画》和《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等革命书籍的行为放在这样一个历史语境、政治生态中去考察、认知，那么我们会清楚地领会这样一种出版行动在当时意味着怎样的危机公关、政治姿态和革命站位展示，而且在《革命文牍类编》中，时事新报馆特地将《预备立宪公会致孟昭常电》《上海宪友会江苏支部致北京总部电》等电文录入，以示自身坦荡之余，进一步坐实了自身“革命”的位置与形象。这是我们在考察民国初年报纸倾向、政治宣传和文化生产时不能不注意的。

四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政治发生重大变化时期，由于新闻被严厉监管、信息不透明、传播方式单一等多元因素，谣言几乎从不缺席。每一条谣言都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

谣言，其来有自。辛亥革命沪上新闻界谣言来源不外乎几个方面，首先，由于中国国内新闻管制和惩罚较严格，因此，从渠道上来说，很多“谣言”都是从“西报”上得来。1900年出版的《觉民报》就指出，“近来沿江沿海一带地方的谣言，必往常更加利害，有中国人未曾知道这话从何而起，那西报上已经说得明明白白，更有那中国人知道这事情，不敢写出来，那西报却是没有什么顾忌，他就公然写了出来。”^④ 武昌起义后，北京方面检查报稿极为严格，人民对于南方的乱事几无所知^⑤，外国报纸就顺势填补了这个消息真空。《时事新报》《申报》在登载革军汉阳失守的消息后，被群众指为捏造谣言，《申报》为自己辩解道，“汉阳失守，消息先见于各西报，而本报亦接有此电，即海上各日报莫不载有此电，捏造之说宁甘诬枉。”^⑥ 所以在1911年12月3日的《申报》第一张第三版上就将该电文原稿铸成铜版刊印出来，以息谣言、正视听。其次，更重要的是，谣言主要来自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不管流播的传言是真是假，按照革命者的现实需要，不利于己的就是谣言，真正的谣言却以新闻的形式存在着，真与假变换了方式、对调了身份以“谣言”面世，可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汉阳失守，本属事实，但它的传播确实有可能对当时千钧一发、危在旦夕的革命形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谣言”在革命者和进步群众的合力之下就产生了，而真正的谣言却以新闻的形式出现。

我们知道，上海光复时革命者的力量十分薄弱，所依靠主要是上海商团公会的武装力量。正如李宗武在《辛亥革命上海光复纪要》中说的那样，“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前的运动，着重在做宣传鼓动工作，秘密机关都设在租界内，武装力量则集中在华界的商团组织里……但是这支武装力量与驻淞沪一带的清军比较，还是很薄弱的。”^⑦ 但也就是恰好在上海光复之前，从1911年10月中旬到1911年11月初前后，上

① 参见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第347页。商务印书馆和时事新报馆在编辑发行《革命文牍类编》上也有合作，从该书第5册、第8册封底都可以看出，两书的寄售处均为商务印书馆。

② 《中国革命纪事本末序》，周光培主编：《辛亥革命文献丛刊》（12），扬州：广陵书社，2011年6月初版，第5674页。

③ 参见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第349页。

④ 《靖谣言以安人心说》，上海《觉民报》1900年第21册。引自桑兵主编：《辛亥革命稀见文献汇编》（一），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万卷楼图书公司联合出版，2011年，第3页。

⑤ “专电”，《申报》1911年10月17日，第1张第3版。

⑥ “专电”，《申报》1911年12月3日，第1张第2版。

⑦ 李宗武：《辛亥革命上海光复纪要》，参见《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资料纪念专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1页。

海报盛传有关孙中山的新闻：孙中山挟巨资内渡，接济革命军华侨以美金二十万助之^①；孙中山在美国募集军费三十万美金以支援革命军，海外华侨均支持革命^②；革命党人已经在日本东京印刷好了钞票，其上有孙中山所签的花押^③；孙中山抵达旧金山，华侨已经募集美金贰佰万元支持革命党人^④；孙中山在芝加哥，准备募集美金伍佰万元支持革命^⑤；孙中山不日至武汉，有大军舰三艘随行，驾驶者都是留英海军学生^⑥；孙中山派军舰携大量军火、华侨助战员、留学生以及二百万军饷至汉口助阵^⑦；“又闻孙文昨乘兵轮行抵上海，同行者颇多，且闻有四烟囪兵舰一艘，昨晚停泊十六铺江面上悬民国军旗，气概甚盛。”^⑧

事实上，辛亥革命爆发之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东部各大城市宣传革命、筹款并破坏清政府借款，筹款并没有多少所得，1911年底孙中山回国时并未带回巨额军饷，在1911年12月25或26日接受《民立报》采访时，孙中山表示，“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着精神而已。”至于在11月3日上海光复时有军舰悬民国国旗，显然更属无稽之谈，上海光复时革命者并没有海军的助力，孙中山后来曾表示“也没有为取得他们的支持而进行任何接触”^⑨，清海军“南琛”“钧和”等各舰投顺都是在上海光复之后。

在11月3日上海光复的前后，类似谣言井喷出现，在敌众我寡的不利条件下，这些谣言虽说有的表明“译自西报”，但据谭人凤的观察，“迨中山到沪，大开宴会，侈谈清廷借款已被破坏，民军方面如何可望列强投资。而其代为吹拍者，又谓业带款项若干，且有外国兵船许与帮助。”^⑩可见，“代为吹拍者”才是这些谣言真正的源头。而它在上海光复前后大量出现的目的不言自明，“世人皆谓革命军之成败，须观军饷之充足与否。”^⑪11月8日，《申报》登载消息称北京已经被革命军攻破，“人民异常欢欣，各街市燃放烟火，悉悬挂国民军旗帜，并陈列国民军首领之肖像。”^⑫在大局骤变之时，安定人心、鼓舞士气显然是最重要的，可以说，革命者巧妙地利用谣言钩织起来的舆论网络在当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在12月初时事新报馆、申报馆受到“国民公启”传单的攻击以及群众在馆内聚众闹事，无疑，这一切都是革命军政府的安排，这仍然是11月初巨款、兵舰谣言在12月初逻辑悖谬发展的必然结果，显然，汉阳失守的“谣言”动摇、并推翻了之前革命者为了虚张声势所造的谣言。因此，12月初的“国民公启”之类的谣言无非就是揪住《时事新报》、张元济等人与立宪党人的关系渊源的小辫子，利用预备立宪公会孟昭常来沪的消息来制造谣言以达到敲山震虎、甄别敌我、统一舆论、消灭“谣言”、稳定民心的目的。

事实上，随着革命胜利后立宪派阵营的分裂，在革命者面前“反革命”的面目已经模糊不清了，因此急需将潜在的反革命者用打草惊蛇的方式揪出来。就在“国民公启”传单盛行的同时，武昌起义、上海光复后仍然坚持君主立宪立场、顽固不化的郑孝胥在其12月4日日记中记载，“昨夜复有投书自称‘革命团’者，中缄印刷传单六纸，题曰：《请看汉奸》，意在恫吓；”^⑬12月5日记载，“又有投书者，用东文，亦恫吓语……闻有新出小报名《迅报》者，附送此单。”^⑭12月6日，郑孝胥在日记中将这类恐吓信息与报馆谣言联系在一起，“日来传单攻余者，乃由报馆攻孟庸生而起。《中外日报》指摘《时事新报·革命危言》语意，《时事报》欲控之于革党军政府……又有投东文函者，劝余自杀。”^⑮12月

① “专电”，《申报》1911年10月17日，第1张第3版。

② “专电”，《申报》1911年10月18日，第1张第3版。

③ “专电”，《申报》1911年10月18日，第1张第3版。

④ “专电”，《申报》1911年10月20日，第1张第3版。

⑤ “专电”，《申报》1911年10月21日，第1张第5版。

⑥ “专电”，《申报》1911年11月2日，第1张第3版。

⑦ “专电”，《申报》1911年11月4日，第1张第3版。

⑧ “专电”，《申报》1911年11月4日，第1张第3版。

⑨ 孙中山：《我的回忆——与伦敦〈滨海杂志〉记者的谈话》，《孙中山自述》，第199页。

⑩ 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596页。

⑪ 《与上海〈大陆报〉主笔的谈话》，《孙中山全集》（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73页。

⑫ “专电”，《申报》1911年11月2日，第1张第3版。

⑬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三），第1365页。

⑭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三），第1365页。

⑮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三），第1365页。

10日,郑孝胥在日记中记载,“梦且言,有某报谓郑苏戡已赴日本,且入日籍。”^①12月13日又记载,“又有投函者,署名唐斌,谓余‘恃孟昭常辩护。上海议和,必将以刀笔破坏革命,已议决:三日内必杀汝,今日晚间可至门外试之。’”^②12月23日又记载,“有乱党投书,言将以初七日杀我。”^③12月26日记载,“是日,杀我者爽约不至。”^④1912年1月16日,郑孝胥在日记中记载,“快亭晤陈其美,陈询:‘郑君犹未他往耶?’有四川某甲电告陈云:‘郑有与议和使交通踪迹’等语,似宜避往大连或青岛为妥。”^⑤1月19日,日记中记载,“佛德言,有闽人从革党者,前数日欲捕李拔可,逻侦甚紧;又于路傍闻有数人偶语,谓‘郑苏戡久无动静,想系真守中立矣。’”^⑥

从郑孝胥日记中一系列的记载可以看出,在南北议和的关键时期,革命者对于未公开赞同革命的立宪派人士采用了谣言加恫吓的政治高压态度来对待,正如郑孝胥在1912年1月11日记载的那样,“寄寓上海者大半附和革党,惟余默然若无所见,宜彼曹之忌我愈甚也。”^⑦革命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郑孝胥这样的立宪党人从上海这样的革命中心赶出去,以保证南北议和不受立宪党人的破坏,当然,其中也包含着对面目模糊的立宪派党人政治立场、行动的甄别和敌我阵线的分辨与判断。

从武昌首义爆发到上海光复时通过宣传最终以弱胜强,再到汉阳失守时“假作真时真亦假”,再到南北和谈时对立宪党人的压制,革命党人在不同的革命阶段通过不同的“谣言”或宣传财力军力以营造声势、或敲山震虎以甄别敌我,或清除潜在的政治对手以达胜势,总之,就是以“谣言”的传播步步紧逼、环环相扣来营造政治高压态势,将共和必胜的理念彻底取代了立宪的观念。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辛亥革命前后沪上革命党人的谣言政治。

当然,在张元济领导下的商务印书馆和时事新报馆一面,在革命党人谣言政治施加的巨大压力下,在自我思想新旧转换、涅槃重生之际,巧妙地通过自己最擅长、最熟悉、最便利的方式来剖白自己,这就是通过文化生产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政治觉悟,它出版了以《中国革命记》《革命文牍类编》《中国革命纪事本末》为代表的一系列革命书籍期刊,展示自身的革命立场和政治站位,可谓是与既往决裂;同时,它又巧妙地将谣言涉及的材料融入了《革命文牍类编》等史料中,比如将预备立宪公会驻京办事处致上海董事电、预备立宪公会致孟昭常电、上海宪友会江苏支部致北京总部电等标志着立宪党人内部决裂电文一起收录到了1912年正月出版的《革命文牍类编(二)》之中,按逻辑依次编排,让材料事实自我言说,反证谣言之诬枉、为自己辩白的同时也通过史料的编纂来为围绕谣言的争论盖棺论定,真可谓一箭双雕。另外,我们必须强调的是,从1911年底跟踪革命时势发展的《中国革命记》(周刊)到1912年初革命资料汇编的《革命文牍类编》,再到1912年革命历史写作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张元济领导下的商务印书馆编译部的上海“自由社”和时事新报馆历时性地共同构筑了武昌首义后最早的关于辛亥革命从时事记载、历史资料汇编到历史体系构建的政治文化生产的完整链条和革命历史话语体系,直到今天,它们仍然影响并塑造着有关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叙事。这段被遗忘的历史对我们研究商务印书馆和时事新报馆,乃至上海辛亥革命无疑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本文受2017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时事新报·学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2017ZDIXM091)资助)

(责任编辑:周奇)

①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三),第1369页。
 ②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三),第1369页。
 ③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三),第1374页。
 ④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三),第1375页。
 ⑤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三),第1384页。
 ⑥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三),第1386页。
 ⑦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三),第1382页。

The Rumor Politics and Cultural Operation

— Take the *China Times* and the Commercial Press around the Restoration of Shanghai as Examples

CHEN Jie

Abstrac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Zhang Yuanji and Wang Yinian, the *China Times* (《时事新报》) was originally created to inculcate the knowledge of national politics and law and prepare for constitutionalism in late Qing Dynasty. Howev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uchang Uprising, with the change of mind of Zhang Jian, Zhang Yuanji and other people and the internal divis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Party, it was one of the newspapers in Shanghai which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to stir up the revolutionary tide, especially cooperated with the Commercial Press to edit and publish a large number of books and periodicals, such as *Revolutionary Documents*, *Chinese Revolutionary Records* and *Revolutionary Party Biography*, which had a great social impact at that time. In addition to the ideological revolutionary tendency of the Constitutional Party and the strong political atmosphere in Shanghai,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full consideration to the pressure of the rumor politics put by revolutionary party on the *China Times* and Commercial Press at that time. In the press ecology created by the revolutionary pressure, the *China Times* and Commercial Press not only proved their political posturing and revolutionary tendency through their own cultural operation, but also relieved the huge pressure brought by the rumor politics of the revolutionaries.

Key words: rumor politics, cultural operation, the *China Times*, Zhang Yuanji, the Commercial Press

(上接第 168 页)

“Should Monks and Taoists Make Obeisant to the Emperor and Clansman”: The Controversy Related to the Compilation of *Longshuo Regulation* in Reign of the Emperor Gaozong

WU Liyu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ntroversy on “should monks and taoists make obeisant to the emperor and clansman”, which occurred in the second year of Longshuo Reign of the Emperor Gaozong. Although previous researchers had pointed out that it was related to the politics of Emperor Gaozong and Empress Wu Zetian, which reflected the actual conflict between rite and law. However, they did not offer specific examples as proof.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links between *Xianqing Rite* (“《显庆礼》”) and the compilation of *Longshuo Regulation* (“龙朔修格”), as well as the importance of rite and law. Furthermore, the controversy was one of the contents of the reforms of rites and laws in the Longshuo Reign. The controversy reflected that Empress Wu Zetian had been in charge of the political affairs, and taken Buddhist ideas as her support, not only as her family relief, but also in her presidency. In addition, the controversy showed the significance of pursuing the equality of emperor and empress. This article also attempts to further prove the relevance to real politics from the intentions of different participants.

Key words: monk and taoists, make obeisant to emperor and clansman, compilation of *Longshuo Regulation*, controversy